

# 秦文化的天下观

□ 欧阳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蕴含了“天下一统”“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等哲学思想。这一思想源于三皇五帝时代，萌芽于夏商西周三代，成形于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晚期，秦人胸怀天下，励精图治，经过秦孝公至秦王嬴政七代人的努力，统一六国，成就帝业，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开创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新阶段。

## 天下观的形成

“天下”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即所谓“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诗·小雅·北山》又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春秋以降，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四夷内侵，中原华夏民族意识空前高涨。齐桓公首倡“尊王攘夷”，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号令诸夏，欲“霸诸侯，一匡天下”。孔子作《春秋》主张天下一统，强调夷夏之辨首先在文化，而且夷夏可以互变。进入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纷纷探讨政治统一、华夏一统的新路径，天下一统理论走向成熟。这一时期成书的儒家经典和诸子学说中，《周礼》主张政治上建立强大的一统王朝；《管子》《礼记》提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中国诸侯“五方之民”共天下的观念；《尚书·禹贡》设计出理想中天下一统的“九州”说和“五服”说；孟子提倡仁政和王道，主张大国“王”天下，强调“用夏变夷”；荀子更是提出了“一天下”；《墨子·尚同》提出“一同天下”；《庄子·天道》主张“一心定而王天下”。天下一统与进化的历史观有机结合，标志着天下一统理论业已系统化，并对秦汉大一统政治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在诸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中，天下一统已形成基本共识，并且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圣王明主共同而一贯的追求。天下一统既是中国早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周秦之际社会上通过政治诉求，成为人们国家观念的基本认知信条。

## 天下观的秦国实践

秦人以天下一统为己任，通过商鞅变法确立以法家学说为治国理论。采取推行县制、迁都咸阳等措施，打破了陈旧的政治生态，为君主专制和政令畅通奠定了基础；经济和军事上通过农战政策、军功授爵的实行，使富国强兵大见成效；在用人上不拘一格，广纳六国贤能之士，形成布衣将相竞相效

命国家的局面，为变法图强提供了人才保障。奖励耕战和移风易俗的推行，收到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良好效果。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变法推动了秦文化转型，转型后的秦文化既保持了意志坚定、功利进取、开放包容、尚武坚毅、富于创新等文化特质，又具有了崇法重刑、耕战为本、军功授爵和实用功利的特点。秦王嬴政在天下统一学说和法家思想的基础上，杂糅法、道、阴阳五行、神仙家等思想，以其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创造性运用于统一战争和秦王朝的制度构建，“奋六世之余烈”，仅十余年就扫灭六合，一统天下，结束春秋以来长达五百多年列国争霸、战乱纷争的动荡局面。为了巩固王朝根基，秦始皇通过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郡县制度以及实行法制等政治措施，统一度量衡和车同轨等经济措施，改革家庭制度和编户制度等社会管理措施，书同文、行同伦和匡飭异俗等文化措施，南开五岭设三郡、北击胡貉修长城、移民实边等军事措施，实行华夷一体的民族融合政策等，创建和确立了一整套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并构建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根基，从而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运行模式和文化传统。

秦王朝的建立，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不仅承上启下，而且开创了历史新纪元。秦国的统一进程，并非商灭夏、周代商那样的朝代更替，而是一次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国家再造，是一次上自君王、下至百姓对组织管理机制改造、社会阶层建构和社会运行模式创新基础上的国家重建。此后，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不论统一政权还是分裂政权，或者少数民族政权，对入主中原和正统的追求，都是天下一统传统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从此，视天下一统为常态，分裂、动荡为非常态，成为国人评价历代王朝得失和历史走向的基本标准。

## 天下观的历史启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秦人、秦国、秦王朝虽然都成为过往，但秦人及其秦文化却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存和精神财富。秦人何以能够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终结动荡纷争的旧时代，开创天下一统的新时代？一般而言，追求统一的政治抱负，积极进取的先进文化，顽强拼搏的民族性格，始终重视军事实力，比较彻底的变法改革等，无疑是助其成功的主要因素。但从更深层而论，还有以下三点尤为关键。

一是坚定的理想信念。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缺失理想信念。从秦人建国之际秦襄公僭越礼制，以天子之礼设畴祭天，到秦穆公

# 秦文化的优秀特质

省政协秦文化课题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我们从秦文化及其特质的形成中，可以深刻地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秦人之所以能从西周的边缘小族，数十代人发奋图强，扫灭“六合”，天下一统，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秦帝国，关键在于秦人孕育发展了与时俱进、海纳百川并具有自身特质的秦文化。这种优秀的文化特质引领秦人战胜千难万险，最终实现了崛起和统一天下。

## 一、注重学习、善于学习

嬴秦族群自登上历史舞台，就善于从观察探索中获取知识，从学习中汲取前进力量，引领族人在两度跌落深渊而浴火重生。秦人远祖伯益带领族人在左禹治水而中深人观察山水走势，把握山泽河流的运行规律，进而因势利导。还因辅佐禹治水功绩卓著，受到舜的赞赏。他们还善于观察鸟兽习性，佐舜调驯鸟兽，探索家庭驯养，让牛马驯服。禹子启夺天子位，伯益被杀，族人四处流散。为了生存发展，学习驾车技术，始有费昌为商汤御，孟戏、中衍为商太戊御，造父为周穆王御。到西周时期，秦人先祖非子养马时就注意学习、总结疫病防治，使“马大蕃息”，获周孝王“分土为附庸”。秦人自襄公建国后，更加主动学习周文化、西戎文化、诸侯文化，创造了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秦文化。比如，军事上，向匈奴学习骑战技术，建立了骑兵制度，秦穆公时大规模设置精骑兵。向戎狄学习，培育了刚健勇敢的尚武精神和质朴坚毅的民族性格。向诸侯国学习发展商品经济，出现了乌氏倮和巴寡妇清等富商大贾，形成了咸阳、栎阳、雍城等空前繁华的城市，实现了“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六。”

## 二、敢于创新、勇于变革

伯益及其族人佐禹治水过程中，汲取禹父鲧治水的教训，新创治水思路，采取疏导方式，“掘地而注之海”，治水获得成功。伯益在治水掘地过程中，

发现地下渗水规律，“伯益作井”，发明了技术更加成熟的“井”。非子在陇右养马，不仅探索创新识马、养马、训马、医马等知识技能，还发现“秦”这种优质牧草并掌握了定期让马饮用含盐泉水有助健壮的秘法，获得周孝王赏识，从此改变了族群奴隶地位。秦人立国后，偏处陇右，国力孱弱，“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孝公为了化解灭国危机，昭告天下“宾客群臣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有卫鞅入秦，商鞅主张“变古”“反古”，反对“法古”“循古”，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度，废除井田制，奖励耕战，走上全面系统改革创新图强之路。随着国力上升、疆域扩大，为了有效管理帝国，秦国没有简单模仿夏商周三代官制和分封制，而是逐步探索完善了以三公九卿为核心的中央统治机构和以郡县制为核心的地方统治机构，为最终战胜六国、缔造“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提供了政治保障。

## 三、尊重人才、重视技术

秦人奉玄鸟为祖先，“敬天法祖”，形成了祭祀对象多杂的信仰祭祀体系。尽管秦人祭拜鬼神，但并不迷信鬼神。在春秋战国大争之世，秦人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尊重人才、重视技术、信奉实力，才能存社稷、保国家。秦人认为“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反对任用“《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十种人，大举招徕各类治世能人，用人唯才，用其所长，使秦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杰出人才不断涌现，像商鞅、百里奚、蹇叔、由余、尉繚、李斯、王翦、白起、司马错、张仪等治世良才效命于秦，国家实力持续增强。秦昭王任命水利专家李冰为蜀郡守，建成都江堰水利工程，让秦国得到了盛产粮食和“铜、铁、竹、木”等战略物资的宝地。秦王政任用水利专家郑国，建成郑国渠，使关中成为秦国粮仓。秦国奖励耕牛生产和以优惠条件向农户提供铁制农具，使得秦国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粟如丘山”。秦国招揽六国工匠，制

以“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自居，从秦武王举鼎绝膑到秦王嬴政伏六王而定天下，历代秦人问鼎中原、一统天下之志坚定不移、一脉相承，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聚沙成塔、久久为功，最终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二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秦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秀的特质，其特色和优势来自秦人宏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进取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在秦文化中，对周文化的继承无疑是其主体成分，但在秦国社会，并未因此而受周礼束缚趋于保守，如血缘宗族和世袭贵族对秦国政治的影响远较东方六国为弱，故以地缘为主的郡县制在秦国、秦王朝得以推行。再如后起的秦人虽然在文化上并没有产生像东方六国那样的大思想家和重要的学术流派，却在重用六国人才并将新的思想文化创造性运用于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的社会实践上，不仅非常成功，而且遥遥领先。究其根本，就在于秦国形成了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文化观，由此确立了其文化始终能够趋向先进的优势地位。

三是坚持富国强兵之道。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和兴盛，既需要正确的道路方向选择和先进的治国理念引领，也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撑，两者缺一不可。秦国在致力发展和崛起中，始终重视经济发展和技术应用，兴修水利，推广铁器、牛耕，以农为本，奖励耕战，是秦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有力支撑。特别是到战国后期，华北平原、关中平原、四川盆地三大经济区秦国独占其二，而且还拥有陇右等西北战马基地，其国力已远超东方六国。可见，国力雄厚、兵强马壮是秦国实现和巩固天下一统的根本物质基础。

纵观人类历史，几千年间，曾出现过不少地域辽阔、辉煌一时的大帝国，但从波斯帝国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古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在各领域骚数百年之后，无不消亡解体为单一民族的普通国家。唯有秦王朝在国家、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所奠基的古老中国，虽历经分裂与动荡，饱受侵略与宰割，却一次次浴火重生，走向复兴，与天地同在，同日月永光，昂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历史上先进的天下一统国家理念和秦文化所奠定的天下一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于此。

当前，我们正在阔步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起点上，在全国上下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宏伟事业中，需要我们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往开来、奠定天下一统基础的秦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既是富矿，也亟待开发。（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2年7月6日6版）

# 秦文化研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意义



□ 侯红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秦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根脉之一，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人从偏西一隅的附庸之民稳扎稳打、步步东进，从部族到国家再到帝国，融汇了商、周、西戎、北方以及西方文明的进步因素并创新发展，秦的制度和文明被汉代承续，泽被后世。秦汉文明奠基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框架，形成了我们延续二千多年的文化基因，影响力最强，辐射最广。秦文化方法是阐释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三大文明古国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弭，只有中国文明一直没有中断，延续至今，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之所以这样，除去中国文明本身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秦所实现的大一统。秦的大一统不仅是我国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疆域统一，还实现了文字、货币等文化、经济的大统一，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中华民族认同感，“华夏族”成为先秦统一的称谓。统一的文化使后世得以继承发展，民族的认同使得国家凝聚力增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延续的重要内因。

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多民族伟大国家的土地上，从史前聚落到历代都城，从帝王陵墓到一般墓葬，保存至今的地上文物和地下文物不计其数。甲骨文、彩陶、青铜器、瓷器、兵马俑、长城见证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和勤劳的结晶。它们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成就，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它们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源泉，也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在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秦帝国虽然短暂，但却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秦帝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其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郡县制度，以及车同轨、书同文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为汉帝国所继承，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汉大一统使得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最终形成，并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以空前加强。然而，秦帝国只是秦历史发展中的最后阶段，秦帝国的诞生同样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秦族早在夏商时期就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西周时期已经建立了部落方国，东周初年被封为诸侯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壮大，至公元前221年终于剪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帝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古族、古国、方国和帝国的四个阶段，而秦族、秦古国、秦诸侯国、秦帝国的历史正提供了这样一条完整的不可多见的发展链条。因此，秦族、秦帝国历史、秦文化对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见，欲要读懂中华文明史，就必须研究秦的文明，欲要认识秦文明，就必须对秦族、秦帝国历史、秦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的考古重大发现，使得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秦兵马俑博物馆、万里长城接待的国内外观众数以千万计，秦物质文化走向世界，先后在许多国家展出，使得全世界人民对中国古代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也更多地了解了现今中国。但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长城只是秦帝国悠久文明的一个片段，而考古发现揭示，除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长城外，秦的考古重大发现层出不穷，如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礼县西山遗址、清水李崖秦墓、陕西凤翔秦公墓、秦都雍城、秦都咸阳等，无不展现着秦文明的辉煌。总之，秦族、秦史、秦文化研究不仅对解读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诚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中原不断吸收和融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的过程。又是各民族、各文化相互交流，不断融合的自然结果，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华夏文化正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古代文明不仅包括中原地区华夏文化，还包括历代周边地区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离开了周边民族文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西戎文化正是先秦两汉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创造使用，并遗留下来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或缺。

秦崛起于西戎之地，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定程度的戎狄性。早期秦文化的某些因素，很可能来自西戎，或者以西戎为媒介而来。比如屈肢葬，对金器的喜好，铁器的传入，动物纹样，短剑的使用，璧瓮等等。晚期秦文化的某些因素，也来自与之毗邻的西戎文化。如洞室墓在战国中晚期秦墓中广泛流行，追根溯源，应来自于陇山西侧的西戎文化。而这种墓形又通过秦文化影响到汉文化，并最终流传下来。总之，秦文化的特性与中华文明十分契合，探索中华文明决不能绕开秦文化的研究。

（作者系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省政协秦文化课题组成员）